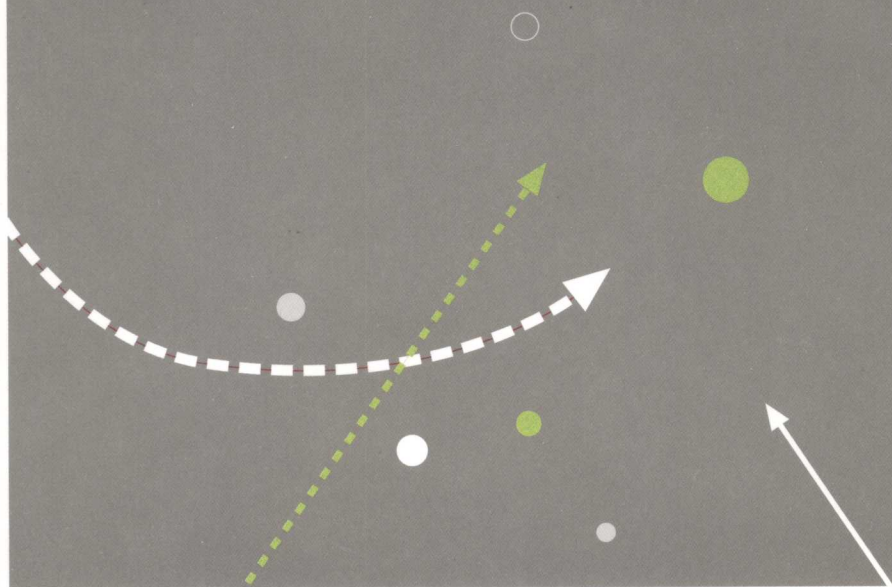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政治与社会译丛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孙龙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总之，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体可以被认为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五个场域，每一个场域要运行良好，都有其自身基本的组织原理。完全可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其他任何场域，或者所有场域的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民主政体之中，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结社权加以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器的支持，以对那些试图以非法的方式妨碍人们行使民主权利以组织起来的人，施行有效而合法的制裁。此外，民主制度的每一个场域都对其他场域产生影响。例如，政治社会创制宪法和主要法律，管理国家机器，为经济社会制定规章制度。因此，在巩固的民主之中，这些场域之间持续地相互协调，每个场域都恰好处于其他场域的影响力“范围”之内。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

孙龙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 199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
欧洲 / (美)林茨, (美)斯泰潘著;孙龙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1辑)

ISBN 978-7-213-03567-8

I. 民… II. ①林… ②斯… ③孙… III. 民主—
研究—西方国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07643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7-52号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胡安·J.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孙 龙等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177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55.8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567-8
定 价 5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一辑主编 景跃进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丛书第一辑总序

作为一项计划工程,本丛书第一辑的书目选择乃是众多考量平衡的结果,其中三个因素值得说明。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理性算计是任何事业得以展开的必要环节。这一变量对于本丛书目录选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选译之书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在读者群,而不应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读物。于是,跨学科性便成为选书的一个操作性标准。

令人宽慰的是,尽管这一标准具有实用的品格,但它并不影响所选之书的学术品位。这固然是由于跨学科性本身并不与学术质量有什么矛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书目选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在横向维度上,丛书第一辑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两者杂交的产品——政治社会学,以及经由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脉络而扩展到旁临学科。在纵向维度上,它涵盖了历史研究与当代学术的前沿性探索。

在这一广泛领域中,对书目选择发挥指导或定向作用的坐标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自然成为选书的第二个操作性标准。丛书第一辑所选作品虽然涉及不同的学科,且具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但它们之间有着一个相似或共同的主题。借用扬(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政治化”(扬使用该术语来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概况)。

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治(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所谓“重新政治化”并非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指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视野,或

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或成为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政策议题。从理论上讲,重新政治化过程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以及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建设的进步,基于公民行动基础上的广义的利益政治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在众多社会问题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生态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公正等方面——将承担起与公众期望相适应的政治责任。质言之,市场经济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同构效应,使得以前被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才发生的事情或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程度不同地面临了。

选书的第三个操作性标准来自学科建设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过选择性的译述以窥见西方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新发展趋势,为本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上述诸种考量虽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总体目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对中国特色的追求(从制度层面到学术品格)是在世界文明这个大舞台上展开的,了解“他者”(尽管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西方”,但其实不止是西方)的过去、当下及发展趋势,乃是追求中国特色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基本背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与认识中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翻译与本土研究之关系,亦当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景跃进

2006年冬

中国人民大学

前言与致谢

在我们所编的多卷本著作《民主政体的崩溃》前言的倒数第二段,我们写道:“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分析威权政体崩溃的条件,分析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特别是要分析后威权时代民主政体得以巩固的机制。”^①这本书即代表了 we 致力于上述研究议程的努力。

首先对本书的书名作一点说明。作为比较研究者,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大多数政治转型都脱离了过去稳定的非民主政体,但是并没有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s)。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巩固的民主政体。^②而且,如我们在 1978 年的著作中曾经指出的,甚至曾经巩固的民主政体也有可能崩溃。^③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认识到在所有主要的政治转型之中,完整的民主转型

①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第 IX—X 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② 事实上,我们相当多的研究工作都用于分析并没有导致完整的民主转型的政治转变。这些国家的突出代表包括王权崩溃之后的伊朗,帕帕·多克(Papa Doc)倒台之后的海地,以及索摩查(Somoza)倒台之后的尼加拉瓜。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一种苏丹制,韦伯将这种形式称为极端的家产制(patrimonialism)。这些案例将在由 H. E. Chehabi 和 Juan J. Linz 所编的关于苏丹政体及其合法性的著作之中进行分析。一个相互关联,但是在分析上互相独立的问题是,当非民主政权倒台或者被推翻之时,会出现一种不完整的民主转型,同时会产生一种“紧急状态下的过渡政权”,民主选举被无限期(sine die)地推迟,以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参见 Yossi Shain 和 Juan J. Linz, *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身为人权组织美国观察的成员,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经常敦促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不要将民主化一词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等国家的纯粹的选举至上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贬低民主化,这些国家即使在选举之后,军队仍然享有巨大的非民主的特权。

③ 在第一章之中,我们将对完全民主转型和巩固性民主给出一个宽泛的定义。

在实际上非常少,也由于我们坚持认为,完整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是值得追求的,因此本书将明确探讨民主巩固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完整的民主转型,以及稳固性的民主政体,就是本书的关键因变量。在本书中,我们将尽力关注可能的策略(possibilist strategies),也将关注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危机,或者国家的缺席是如何为成功的民主转型创造条件的。

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如下解释路径和观点。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关注点,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与本书其他部分直接相关。在第一章开头我们即对本书的两个因变量,完整的民主转型和巩固性的民主政体,进行了讨论。接着我们论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为什么民主需要五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才能得以巩固,是如何巩固的。这些条件包括: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法治、可资利用的官僚组织(usable state)以及经济社会(注意,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①,任何一个场域都与其他场域相互作用、互相强化。在第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们讨论了七个我们认为对于分析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独立变量,我们以这些变量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命题^②。其中的两个变量非常重要,我们将其称为宏观变量,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加以讨论。

第二章我们讨论了第一个宏观性的自变量,这个变量在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文献之中必须被认真地提到,即国家、民族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这个变量称为国家性(stateness)。我们将阐释为什么主权国家(sovereign)的存在是民主以及切实的公民权(citizenship)的先决条件。接着我们将探讨当国家和民族不一致,或者民族国家和民主的逻辑发生冲突之时,不同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策略对于民主的含义,事实上这种不一致和冲突经常发生。

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宏观变量,即初始政体的类型。我们认为,关于通向民主的路径,可以用修正后的“路径依赖”概念加以概括,这对于我们重新分析现代的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非常重要,不同的转型过程就

① 当我们提出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至少需要包括这些支持条件时,我们心中并没有一种终极性的目的论,因为在每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五个非常明显相互影响的场域。不过,巩固的民主政体在平等的范围以及参与的热烈程度方面,存在性质和程度方面的显著差异。

② 无论好坏,我们也不会将我们自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历史的特殊性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讨论一些变量(如领导个性和时机选择)的影响,虽在这里没有形成独立的命题,但是这些因素对于任何特殊个案的历史分析都非常关键。

是以这些非民主政体为起点的。为了进行以上分析,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修正了现代非民主政体的类型学:全能主义政体(totalitarian)、后全能主义政体(post-totalitarian)、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和苏丹式政体(sultanistic)。在第四章我们将尽可能清楚地阐述,对以上四种政体类型来说,哪些是民主转型的有效途径,哪些不是有效途径。我们还要讨论,一个国家从四种政体理想类型之中的某一种开始,到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的过程之中,在五个场域的每个场域之中,必须完成哪些可预期的任务。

xv

第五章我们讨论自变量中的另外五个变量。两个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另外三个是以情境为中心的变量。两个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一个涉及的问题是先前的非民主政体的领导是什么类型,一个涉及的问题是由谁启动和控制着转型进程。三个以情境为中心的变量分别涉及国际影响、合法性和强制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制宪环境。

在本书第二、三和四部分,我们应用第一部分提出的这个框架,对14个国家进行了分析,既进行了跨区域的比较,也进行了区域之内的比较。在研究以及写作的过程之中,作者中的一位或者两位,对13个国家(不包括这些国家的继承者)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进行了多次访问。作者中的一位或者两位还对一些相关的国家,如韩国、秘鲁、玻利维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什么研究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排除一些潜在相关的案例?为什么发表形式体现为作者的专著,而不是编论文集?因为从事国别研究的专家对特定国家的理解,必然超过我们。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在这个创造关于民主(和非民主)政治知识的阶段,一个核心的任务是使用非常严格的跨区域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世界不同区域民主化的主要的差异性和类似性。我们相信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从单一作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此外,我们也相信情境化的、区域内的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的关注并且解释一些主要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对某个国家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中可能会被忽视。

为了将跨区域分析和区域内比较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们决定选择并直接观察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分属三个不同的区域。只有当一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在近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种比较才有意义。这限制了可能

的区域选择范围。^① 我们所选择的南欧,在 1970 年代即处于欧洲共同体民主核心的外围;而我们所选择的南美,属于资本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但并非是社会、政治学 and 经济学意义上的高级阶段的民主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最后,我们所选择的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直到最近还处于一种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体制之下,我们认为,这些地方“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这与新近出现的民主和市场导向产生了一种紧张。

在这三个不同的区域,我们决定考察所有相关国家,而不是选择一些可能具有特殊性或者会在事先导出某些结论的国家。最容易选择的是南欧。在过去的 30 年中,只有三个南欧国家开始了民主转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所以我们的研究包括了所有这些国家。

根据现代史和现代学术研究,我们在南美选择了一组国家。四个相对发达的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早期,民主政体被颠覆了,而按照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的著名分析,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官僚威权政体”。这些政权取缔大众组织,压制公民社会,由等级制的军人团体进行领导(不同于南欧国家),在其制度和文化层面则留下了“总统制”的遗产,而非“议会制”遗产^②。直到 1987 年,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都还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直接观察可能的转型和可能的失败。^③

① 在 1990 年代早期,这些区域排除了非洲和伊斯兰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思的小型区域。但是这一区域必须包括朝鲜等尚未自由化、民主化的地区。我们相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可以利用我们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尽管它们具有儒教背景。对韩国,特别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我们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宏观变量,国家性。

② 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Series, 1973), 以及 David Collier 编: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30 多个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比较缺乏分析性,而对任一个案而言,则难以处理。我们认为,这个地区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组国家,每组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地缘政治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三组包括:安第斯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属于欠发达地区,在文化方面则具有浓厚的本土特性;中美洲地区,在内战和美国的卷入方面更为突出;加勒比的各个小国,在以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多数国家都具有比较长的议会民主的历史。

③ 在 1987 年,智利经济繁荣,等级制的军人团体在皮诺切特(Pinochet)领导下团结紧密,而民主反对派处于分裂之中。在阿根廷,1989 年的民主处于极端危险之中,首位民选总统,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在其就职典礼之后,就一直受困于五次下级军官政变和十二次总罢工,而经济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之中。由于骚乱,阿方辛被迫离职出走。1989 年,在巴西这个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等级制军人团体的影响仍然具有影响力,总统直接选举仍然没有进行,而获得广泛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已经脱颖而出,而在其身后事实上没有组织化政党的支持。在本书写作之时,巴西的民主仍然没有充分巩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我们决定选择所有那些明确归属于苏维埃体系的国家,它们在防务上受制于《华沙条约》,在经济上属于经互会。因此,我们的分析包括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① 对比较研究者来说,目标是认识并且评估共同性和差异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所有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它们都接受前苏联强加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制度的统治。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的遗产,这一区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在对这些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将后共产主义政治的研究整合进比较政治研究之中,于是我们在本书结束之时试图将这个重要问题,以及后共产主义的多样性纳入一种完全比较性的和理论性的视野之中。^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迫重新修正并反思我们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的许多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书关于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篇幅最长(我们对这个区域最缺乏专长,而且语言能力也最为缺乏),这有些冒险,而且似乎不符合常理。这种学术探索可能不适合于所有的读者,但至少对作者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在准备本书之时,我们使用了多种方法:类型学分析,调查分析,内容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和路径依赖分析,博弈分析,对众多关键人物和最有影响人物的访问。我们相信,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民主化的理论导向的、经验性的、同时进行跨区域比较和区域内比较的研究著作,它体现了作者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点,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时,我们即已敏锐地意识到了其固有的局限性。毫无疑问,考虑到基本的历史研究才刚刚有所进展,如果我们用五年时

① 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唯一排除的是民主德国,由于其“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形,就其自身是否合并到已经成型的民主国家联邦德国进行了投票。这样,除了1990年3月18日到1990年10月3日期间,民主德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主国家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缺少民主德国,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林茨出生在德国,1990—1991年曾在柏林高等研究所(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工作。在以政权“崩溃”为个案对国家性问题进行探讨之时,我们将提到当时民主德国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去秘密化(informer-lustration)综合征。按照我们的标准,南斯拉夫必须排除在外。但是从分析上说,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苏联相似。如,在时序上没有民主化而进行自由化,在中央进行多党竞争性选举之前,即在地方共和国实行多党竞选,联邦政体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结果是国家的分裂(其中的例外是斯洛文尼亚)和民族主义政权(ethnocracies)的出现。作为苏联研究的一个延伸,我们将对这种形式的国家分裂结果的探讨扩展到俄罗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这些国家,公民资格问题以及政权民族化问题都成为一个主要问题。阿尔巴尼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和经互会成员,而在我们的多数研究将要结束之时,它还没有开始民主转型。

② 我们在第一部分描述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当代非民主政体的类型学,为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差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策略。

间来研究和思考后共产主义欧洲,那将是一部更好的著作。但是,作为力图与我们广大国际学术共同体进行互动的学者,我们相信这本书现在就出版可能更为有用,这样众多正在撰写他们第一部著作的新生代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及实践者,就可以了解我们提出的假设性的观点。我们希望我们的后继者在对现代历史这段最为激动人心、最为艰难的进程进行更好理解的基础上,能够完善,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反驳我们的观点。

xviii 我们还将指出本书的其他局限性。我们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类型,也鼓舞了我们。未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历史学家的材料,但是也许和民主理论或者民主化理论不是很相关。一些研究者试图模仿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建立社会物理学或者社会变迁模型,本书可能令这些人失望。但是,我们猜想,这些社会变迁模型也将作为历史资料使用。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宿命。我们所研究的事件发生在历史的时间点上,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之中,发生在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国家和民族之中。我们坦然面对我们研究中所固有的局限性。然而,我们相信,理解这些发生在 197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之间的事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并且激动人心的任务。无论我们是否成功,分析发生在 3 个大洲、30 多个国家的、至少涉及 5 亿人口的生活(一位作者是这 5 亿人口中的一位公民)的这些事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①。

本书有很多缺憾,但我们还是要向众多人士衷心致谢。在耶鲁大学(1978 年我们在这里撰写《民主政体的崩溃》一书前言之后不久,我们合作开设了第一门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胡安·马奇研究所(Juan March Institute)以及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我们过去或者现在的学生,给我们的写作提供的建议不仅涉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也不止一个,他们就我们先前的分析所做的评论非常有益。我们感谢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同事,他们和我们一起阅读经典的民主理论著作,和我们分享他们关于南欧和南美的批评性洞见,也和我们探讨他们所认为的潜在

^① 我们认为,本书一个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又非常必然的局限性是,由于要将分析纳入一本书的篇幅之中,我们大大压缩了关于南欧和南美“民主转型阶段”的讨论,一如我们在各章的注释之中所做的澄清,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在其他地方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我们也省略和简化了一些观点的论证,这些观点在我们过去 20 年的学术作品之中非常重要,如时机选择、领导风格、宗教和法团主义。当然,在本书之中,我们将我们的分析路径和这些主题统一了起来。

的主要转型式变迁(transformative changes),如韩国、菲律宾、伊朗和波兰,这些国家最终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在这里感谢的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 Nancy Bermeo, H. E. Chehabi, Paloma Aguilar, Ed Gibson, Robert Fishman, Daniel V. Friedheim, Charles Gillespie, Jan T. Gross, Luis Eduardo González, Jonathan Hartlyn, Mimi Keck, Robert Martínez, Guillermo O'Donnell, Vello Pettie, Oleg Protsyk, Cindy Skach, Brian Smith, Hector Shamis, Evelyn Huber Stevens, John Stevens, 以及 Mark Thompson。他们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要感谢柏林高等研究所,林茨于 1990—1991 年度在此担任研究人员,并就本书的部分初稿主办了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海德堡大学邀请林茨担任马克斯·韦伯访问教授,对本书的早期工作也是一个鼓舞。两位作者也非常高兴地感谢马德里的胡安·马奇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撰写这么一本涉猎广泛的著作的鲁莽行动,也得益于我们作为参与者合编多卷本《南欧民主巩固的政治学》(*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两书之时一些同事的建议和鼓励,前书由我们和 Richard Gunther、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 Jürgen Puhle 合编,而后者由 Linz、Larry Diamond 和 Seymour Martin Lipset 合编。斯泰潘还要感谢两个多年、多卷本的计划,第一个项目由 Adam Przeworski 主持,对东方—西方转型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可持续的民主》(*Sustainable Democracy*);另外一个项目则由 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主持,最终出版了《威权统治的转型》(*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还要感谢牛津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1993 年的盛情邀请,让他在这里担任资深研究员,而 Timothy Garton Ash、Archie Brown 以及 Alex Pravda 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他们是 Yitzhak M. Brudny, László Bruszt, Richard Gunther, János Kis, Wiktor Osiatynski, Paulo Sergio Pinheiro, Anna Seleny 以及 Samuel Valenzuela。

Richard Rose 应当获得我们特殊的感谢,因为他和维也纳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学社(Paul Lazarsfeld Society of Vienna)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用于研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迁以及公众对那些变迁的反应。他慷慨地允许我们广泛使用那些调查数据——当然,对这些数据库如何解释是我

们的责任。同样的感谢应该给予 Hans-Dieter Klingemann,他允许我们使用关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调查资料,在各章之中我们都感谢了相关作者。我们特别感谢 Marta Lagos,因为他使我们接触了“拉美舆情调查”(Latino Barometer)尚未发表的资料。在我们看来,民意调查为民主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在我们这样的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关于民主的全球舆情调查”。

我们还要感谢很多位总统、总理、部长和反对党领袖,以及民主转型数以百计的重要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他们接受了时间较长的访问。这些人包括工人领袖,如波兰的 Lech Walesa,巴西的 Luís Ignácio da Silva(“Lula”),他们从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也包括占统治地位的干部或者军官集团之中的成员,他们倡导并设计了最初的自由化,这些人包括前苏联的 Aleksandr Yakovlev,以及巴西的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将军;以及一些签署了历史性文件的政治领导人,如西班牙前首相 Adolfo Suárez,乌拉圭总统 xx Julio María Sanguinetti;还包括一些专业学者,他们曾经是公民社会理论家,而在新民主制度下他们成了政治领袖,如波兰的 Bronislaw Geremek,巴西的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还包括一些领导人,如阿根廷前总统 Raúl Alfonsín 试图组织法庭审判来民主地对待过去的遗留问题,比如军人政权如何为“失踪者”承担责任。在本书的相关内容中,我们在引述这些访问以及其他访谈资料的细节时,都有针对性地致以了感谢。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衷心感谢福特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机构(Carnegie Corporation),它们慷慨资助斯泰潘在所有三个区域进行广泛的实地研究,特别是在 1991—1993 年对后共产主义欧洲进行研究;他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和中欧大学,鼓励他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工作,而免除其学校行政事务。我们再次愉快地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 Henry Tom 合作。我们感谢 Ken Eaton 耐心地制作了索引。

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夜以继日,费时甚长,辗转于柏林、巴西利亚、布达佩斯、纽黑文、纽约、马德里、台北和华沙等多个地方。

我们谨以此书献给 Rocío de Terán 和 Nancy Leys Stepan,他们是在智识及诸多方面的同事和合作者!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1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一章 民主及其场域	3
第二章 “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16
第三章 现代非民主政体	40
第四章 初始政体类型对转型路径及巩固目标的影响	59
第五章 行动者与情境	71
第二部分 南欧：民主巩固的完成	
第六章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的范例：西班牙	91
第七章 从临时政府到转型与巩固同步进行：葡萄牙	121
第八章 中下级军人政权的危机：希腊	135
第九章 南欧：总结性反思	144
第三部分 南美：受限制的转型	
第十章 具有风险的巩固民主：乌拉圭	157
第十一章 效力、合法性危机和民主国家的出场：巴西	172
第十二章 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民主博弈：阿根廷	197
第十三章 不完整的转型/接近巩固：智利	212

第十四章	南美:总结性评论	226
第四部分	后共产主义欧洲:最为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	
第十五章	后共产主义的史前史	241
第十六章	威权共产主义、伦理性公民社会和矛盾的政治社会:波兰	261
第十七章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多种形式: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301
第十八章	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影响下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	356
第十九章	“国家性”问题与转型:苏联与俄罗斯	381
第二十章	当民主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冲突之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418
第二十一章	后共产主义欧洲:对比较研究的总结	454
索引		481
译后记		516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